

《左傳》敘事之結構思惟 ——以「鄭伯克段于鄆」為例

陳逢源*

摘 要

《左傳》不僅是歷史之鉅著，更是文學之寶典，推究其敘事手法，更可窺見其結構性之思惟，本文以「鄭伯克段于鄆」一段為例，嘗試推究其敘事線索，以叔段之叛，卻歸咎於莊公有意縱容，此既關乎敘事角度的掌握，以及史家對於事件「遙體人情，懸想時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的揣摩，《左傳》以「莊公寤生」作為事件的緣由，更以武姜惡長愛次作為全篇主軸，藉由三段鄭國君臣之間的應對，既層層而進，又迴環相合，於是叔段奔共，僅是「危機」的「解決」，而「糾紛」的化解，更在於莊公、武姜終能母子和諧，既暗寓國事、家事出於心念之間，更寄託人倫和諧的訴求，其構思之藝術手法，自是不免令人讚嘆，而敘事之觀點更可據此而推，文學與經學之間，似乎有其肌理相通的脈絡，也就不難理解。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第六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關鍵詞：《左傳》、經學、敘事、結構思惟

《左傳》敘事之結構思維 ——以「鄭伯克段于鄆」為例

陳逢源

一、前言

《左傳》之價值，前人論之詳矣¹，只是以往集中道德褒貶分析，與經旨相應的檢討，而疑古思潮之下，考辨《左傳》真偽，更是成為駁斥孔子作《春秋》，質疑左邱明以傳解經等說法的重要環節，於是民國以來，多集中於真偽考辨。只是舊說既不可信，以楊伯峻先生用力至深，也僅能得出孔子年老無法修撰《春秋》，而《左傳》作者可能只是受孔子影響的儒家別派，並非左邱明的答案²。文獻無徵，考據自是無可奈何³，至於褒貶是非，又常是仁智互見，莫衷一是，兩者前人既難

¹ 詳見張高評撰《左傳導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8月）第六章「《左傳》之學術價值」歸納之內容。頁139~177。

² 參見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5月）「前言」，頁5~34。

³ 晚近張以仁先生重新檢討楊伯峻說法，認為其中仍有商榷餘地。見氏撰〈孔子與春秋的

有定論，後世也未必有一致的看法。不過《左傳》引人入勝，敘事之精彩，卻是自古以來人無異辭，劉知幾《史通》云：

《左傳》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彪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捷勝，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若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⁴

劉氏稱賞可謂極矣，而推敲其中，乃是《左傳》敘事極具感人之效，除用字精確，一字千鈞外，藉由剪裁史料，巧為佈局，因而結構綿密，深中事理，成就超越古今，《左傳》敘事之安排，更可見其藝術構思，劉熙載《藝概》云：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裁剪運化之方，斯為大備。⁵

於是在剪裁調整之下，事例生動，人物鮮明。雖然《左傳》以編年為體，但其骨幹，卻是以事件為中心，而在巧構敘事之餘，不僅人物形象因而彰顯，更具體裁變化之妙，劉知幾云《左傳》「言事相兼」、「敘事之最」⁶，也就足以說明其體裁多變，敘事巧妙，吳闓生云：「左氏著書，其文章必自具首尾。」⁷更可見其結構思惟⁸。

關係》，《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1月）頁1~59。

⁴ 劉知幾撰 浦起龍釋 呂思勉評 《史通釋評》（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4月）卷十六〈雜說上〉，頁430~431。

⁵ 劉熙載撰 《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6月）卷一〈文概〉，頁1~2。

⁶ 劉知幾撰 浦起龍釋 呂思勉評 《史通釋評》卷二〈載言〉，頁32、卷八〈模擬〉，頁191。

⁷ 吳闓生撰 《左傳微》（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12月）「例言九則」，頁9。

⁸ 楊義撰 《中國敘事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介紹中國敘事理論，

以文學理論而言，回歸於文本，乃是解讀文學最重要的關鍵；以經學而論，「回歸原典」亦是歷來解決學術論爭的不二法門⁹。《左傳》不僅是歷史之經典，更是文學之寶典，兩者不僅是「交疊關係」¹⁰，甚至以從屬而論，唯有了解「剪裁運化之方」，歷史也才有再現的可能，所以回歸於敘事脈絡，分析手法，雖然非關考據，也無關乎經解是非，卻可以深究《左傳》敘事構思所在，更具探驪得珠之效¹¹，馮李驊〈讀左卮言〉云：

《傳》中有議論之精，辭令之雋，都經妙手刪潤，然尚有底本，至敘事則全靠自己剪裁，……種種手法，開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¹²

馮氏分析出二十幾種敘事方法，說明《左傳》敘事之巧妙，而近人張高評先生更

即首列「結構」，頁 37~128。

⁹ 參見林慶彰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3月）「新舊傳統競爭中的回歸原典運動」一節，頁 39~51。以「回歸原典」來說明清初考據學興起的思想脈絡，然而以清儒嘗試揚棄的宋學，其集大成的朱熹，強調以經求經，希望廓除漢、唐以傳解經的紛擾，卻也同樣揭櫫「回歸原典」的訴求。見束景南撰《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頁 800。可見回歸於經典之中，重新得其養分，乃是不同的學術發展之中，共同的訴求。

¹⁰ 劉鳳泉撰〈左傳敘事文學價值論略〉云：「《左傳》在對歷史材料的組織中往往包含了敘事文學的巧妙構界，既挖掘歷史的真，也顯示藝術的巧。這種情況體現了歷史寫作和敘事文學在材料組織層次上的部分交疊關係。」，《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 21 卷 1 期（2002 年 1 月）頁 51。

¹¹ 葛兆光撰《思想史研究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4月）第三講「後現代歷史學的洞見與不見」，云：「後現代歷史學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歷史看成語言的虛構、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歷史學到懷特，已經形成了後現代最重要的觀念，即歷史只不過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和敘事散文體的論述。」頁 78。

¹² 馮李驊撰《左繡》（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讀左卮言〉，頁 49~51。至於有關之分析，可以參閱蔡妙真撰《追尋與傳釋——左繡對左傳的接受》（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年8月）第五章「《左繡》對《左傳》結構修辭之分析」有「敘法」一節，頁 265~271。

總結前人評點之說，歸納出三十種敘事方法¹³，其中雖有交疊重出，但敘事手法之繁複多元，正可以瞭解《左傳》作者構思之努力。《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一節，敘事生動，誠乃讀《左傳》者最熟悉之載事，然而歷來卻是意見紛呈，莫衷一是，或譏鄭伯失教，或論叔段不弟，孰是孰非，終無定論¹⁴，本文期以擺脫褒貶義例，嘗試以敘事觀點，釐清其結構安排，以不同角度了解《左傳》構思所在。

二、隱藏的主角

以敘事之過程，首先即是敘述主軸的安排，而敘事主軸首重人物之選定，此既關乎視角，更關乎史料的選擇¹⁵，以《春秋》隱公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鄆」，主

¹³ 張高評撰《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九章〈為敘事文字之軌範〉，共歸納有「正敘」、「原敘」、「順敘」、「逆敘」、「對敘」、「類敘」、「側敘」、「帶敘」、「串敘」、「虛敘」、「追敘」、「連敘」、「插敘」、「暗敘」、「直敘」、「婉敘」、「平敘」、「言敘」、「語敘」、「瑣敘」、「補敘」、「陪敘」、「突敘」、「預敘」、「提敘」、「結敘」、「拖敘」、「錯敘」、「搭敘」、「夾敘」等三十種敘事方法，頁149~160。

¹⁴ 韓席籌撰《左傳分國集註》（臺北：華世出版社，1978年12月）卷九「鄭共叔段之亂」，評云：「叔段之亂，胡康侯專罪鄭伯，馮氏解春集駁之，二說皆有所偏，而馮氏尤甚。夫段以莊元年就封于京，日以田獵騎射為事，多材好勇，漸蓄異志，完聚繕兵，欲為桓叔之病翼，蔡公之入郟，不臣不弟，信有罪矣。莊公逐之，似不為過。然而段莊之母弟，姜氏之愛子也，莊公不能早選師保，教誨而輔導之，段之驕佚，莊公不能辭其咎也。」頁493。或專罪於鄭伯，或罪責叔段，甚至兼取兩說，推究鄭伯、叔段之功過，遂成為歷來詮釋《左傳》「鄭伯克段于鄆」的重點。以吳闈生撰《左傳微》為例，既列標題為「鄭共叔段之亂」，但下文注「此篇以誅莊公之不孝為主」，頁10。同樣也有詮釋旨趣的矛盾，推究其原因，實乃出於《左傳》敘事安排的結果。

¹⁵ 近人王靖宇先生檢討現代小說評批家的意見，認為觀點不僅是敘事手法的主要關鍵，更是敘事文學藝術的精華。見氏撰〈中國敘事文的特性——方法論初探〉，《中國早期

語(subject主體)既是「鄭伯」,主角自然也是鄭莊公,「段」不過是作為賓語(object客體)的存在,主客既分,鄭莊公與共叔段,雖然同屬事件主要人物,但輕重有別¹⁶。然而就事而論,此事基本上乃是共叔段之謀叛,以同屬人倫篡逆之事,《左傳》隱公四年載衛州吁弑其君,州吁不僅遣使告宋,又問定君於石碣,作為敘事之主角,至為清楚¹⁷,而以《左傳》莊公十二年載宋萬弑君後兵敗逃竄為例,經書「宋萬出奔陳」,敘事同樣也可以清楚明白,以歷史而言,事件主角為敘事中心,本是理所當然¹⁸。然而《左傳》載共叔段,不論敘及武姜之偏愛,莊公之封賞,甚至於在鄭伯君臣之商議中,叔段皆是被討論的對象,相關行事,從「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到「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最後「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¹⁹,藉由三段材料,以層層而進的描述,彰顯叔段野心勃勃,擴張勢力,終至密謀叛亂的情態,符合順序漸進的敘事模式,然而作為事件的核心,《左傳》卻是採取敘述的方式進行,於是「貳於己」的圖謀,「將襲鄭」之陰謀,事屬機密,卻未見交代叔段的思量安排,反而是「公聞其期」,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²⁰其實「聞其期」,不僅是窺伺之密,回歸於敘事主軸,更是作為敘事對象的必然結果。自此,情勢急轉直下,莊公「可矣」一詞,呼應子封的質問,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又與之前「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呼應,

敘事文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9年4月),頁15。

¹⁶ 史蒂文·科恩、琳達·夏爾斯撰 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9月)第四章「敘事的結構:故事」中「角色的功能」一節。頁75。

¹⁷ 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臺北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5年12月)卷三,頁56~57。

¹⁸ 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卷九,頁154。

¹⁹ 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卷二,頁36。

²⁰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臺北:明達出版社,1982年9月)卷一,頁23。

而「京叛大叔段」，更是承接「不義，不暱。厚將崩」一句，於是全篇之中，前有所言，後有呼應，兩相契合，因果瞭然，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針織密合，不僅暗示一切皆在莊公掌握之中，更在《左傳》敘事安排之下，呈現秩序明快，結構井然的形態。然而分析其中，原本應是事件的主角，卻成為被談論的對象，叔段隱沒於敘事之中，最明顯的特徵，莫過於叔段的「無言」，缺乏話語的安排，主體在話語中的空缺，形成一種不在場的描述²¹，讀者甚至無從窺視叔段的內心世界，一切竟似在莊公的安排下，依序進行，下場自然也毫無意外，最後叔段謀叛不成，出奔於共，符合讀者預期，一切盡在情理之中。不過《左傳》以書法說明，取代下落的交代，分析《春秋》書例，固然開啓歷來有關鄭莊公是非功過的討論，但以敘事角度而言，則已跳出敘事模式，以議論分析的方式進行，而背負謀逆罪名的叔段最後卻是杳無音訊，下場如何，竟如謎團，雖然《左傳》隱公十一年載鄭莊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²²，共叔段似乎是流亡於外，司馬遷《史記》即採此說²³，然《公羊》、《穀梁》卻云鄭伯殺段²⁴，兩者說法明顯衝突，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云：

《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最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聖（原注：《春秋》作「段」），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敘事，

²¹ 史蒂文·科恩、琳達·夏爾斯撰 張方譯 《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第四章「敘事的結構：敘述」中「話語」一節。頁 113~123。

²² 杜預注 孔穎達疏 《左傳正義》卷四，頁 80。

²³ 瀧川龜太郎撰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 年 10 月）卷四十二〈鄭世家〉，頁 675。

²⁴ 何休解詁 徐彥疏 《公羊傳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5 年 12 月）卷一，頁 13。以及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穀梁傳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5 年 12 月）卷一，頁 10~11。

又與《公羊》同。²⁵

《竹書紀年》既以叔段為莊公所殺，則《公羊》、《穀梁》說法未必無據，可見鄭莊追擊，叔段是生是死，春秋之時傳聞已多，也就留下千古疑案。今且不論褒貶是非，推究鄭莊是否殺段，似乎已非重點，但叔段生死成謎，何嘗不是隱沒於敘事主軸的緣故，《左傳》載鄭伯克段，在敘事主軸的安排上，似乎有意留下此一歷史空白。

事實上，檢視《左傳》之載錄，溯自鄭武公、武姜，乃是刻意將此兄弟鬩牆之事，歸之於莊公「寤生」，所以武姜惡長愛次，偏心叔段，成為事件的核心，王崑繩《左傳評》云：「叔段之禍原于武姜，故從武姜敘起。」²⁶吳闓生《左傳微》云：「亂源在此，敘述瑣曲，特妙！」²⁷皆是點出《左傳》特殊的布局，分析其中，《左傳》以「初」字起始，乃是追述前事的習用語，韓茨慕《左傳句解》云：「凡傳言初者，因此年事推其所由始也。」²⁸事實上，鄭武公十年（西元前七六一年）娶申侯女武姜，十四年（西元前七五七年）生莊公，十七年（西元前七五四年）生叔段，莊公即位之初，年僅十五，而至魯隱公元年（西元前七二二年）叔段奔共則已二十二年，《左傳》於此推究淵源，追溯前事，其實已超過三十六年，歷時既久，事件之因果，其實已難以直接按覈，《左傳》簡化線索，由武姜的偏愛，而致兄弟失和，敘事既隱沒叔段，遂使莊公、叔段兄弟情誼付之闕如，錢鍾書云：

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時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

²⁵ 陸淳撰《春秋集傳纂例》卷一，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第一四六冊，頁385～386。

²⁶ 王崑繩撰《左傳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8月）卷一「鄭伯克段於鄆」，頁1。

²⁷ 吳闓生撰《左傳微》卷一，頁10。

²⁸ 韓茨慕撰《左傳句解》（出版地不詳：大成書局，1929年），頁1。

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²⁹

則叔段之叛，誠乃《左傳》作者「遙體人情，懸想時勢」的結果，其實以莊公即位之齡，實難拒絕武姜請託，二、三十年間，又豈無兄弟親睦之情。然《左傳》卻無一語相及，直接切入武姜偏愛，亟請立段，已違常情，而莊公即位之後，武姜請制，選擇險要，更顯見其偏心不改。莊公以「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一句，化解武姜要求，然而其中似乎已具心機，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

莊公亦有心，佯為愛弟者而拒之。……魏禧曰：「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又曰：「婦人愛少子而多嫌忌，已一死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以堅之。」³⁰

可見莊公故示親愛，卻未必純然善意，王崑繩《左傳評》云：「二語極篤愛，唯恐陷弟不義，後敘莊公無限殘忍，卻如此作起。」³¹可見兄弟之間已有心結，叔段後既得京，京之違制，於祭仲之言，已可得見，《史記·鄭世家》更直接作「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³²則武姜請京，恐怕也早在莊公意料之中，而叔段僭越之心，也於此可知。《左傳》更於敘事之中，別錄叔段稱「京城大叔」一句，威勢之盛，溢於言表，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

「謂之京城大叔」一句，極有神采。叔而曰大，別之曰京城，此乃眾人所尊稱，而隆重尊嚴，威儀逼人之狀如見。³³

稱為「京城大叔」，不論稱之者為莊公，抑或國人，皆已顯示其莊重尊嚴，令人側目，稱謂之間，已具神采，《左傳》敘事之傳神，於此可見。然而深究其中，莊公

²⁹ 錢鍾書撰《管錘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月）第二版，頁166。

³⁰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0。

³¹ 王崑繩撰《左傳評》卷一「鄭伯克段於鄆」，頁1。

³² 瀧川龜太郎撰《史記會注考證》卷四十二〈鄭世家〉，頁675。

³³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1。

以京城安置叔段，恐怕並非出於偶然，《左傳》載石碏諫衛莊公曰：「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³⁴京既違制，可以鑿服武姜之求，養叔段之欲，鄭莊公謀劃之初，已有意以「寵祿過也」來「階之為禍」，所以叔段威勢日盛，野心日熾，終至謀叛，不僅出於莊公有意為之，而日後「京叛大叔段」，會如此迅捷明快，似乎也就有跡可尋³⁵。所以莊公與叔段，一顯一伏，敘事主軸的確定，視角明確，以結構而言，叔段從叛逆的主角，成為隱沒的配角，其實是頗具寓意的手法，莊公既掌握所有節奏，似乎也說明叔段成敗不由自己，累積經營，終究無法擺脫命運的安排，至於後世討論莊公多於叔段，也並非純然是《左傳》書法說明的影響，而是敘事安排必然產生的結果，視角所在，自然牽動讀者的關注³⁶。

三、層遞而進的情節

敘事主軸既已確定，再者即是敘事內容的安排，以文學而論，乃屬情節的設計；以史學而論，則是史料的剪裁安排，範疇雖然有異，但閱讀效果則為相同³⁷。

³⁴ 杜預注 孔穎達疏 《左傳正義》卷三，頁 53。

³⁵ 按：晉驪姬之亂，重耳奔蒲，蒲城尚且願以一戰，以抗獻公，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杜預注 孔穎達疏 《左傳正義》卷十五，頁 250。以共叔段居京，經營既久，完聚準備，將以謀叛，竟難以抵禦子封之攻，顯見莊公平日並非僅是窺伺而已，其「叛」字恐非虛語，尋其線索，雖說「佗邑唯命」，但武姜請京，應在莊公意料之中。

³⁶ 楊義撰 《中國敘事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 6 月）〈視角篇〉云：「敘事視角是一部作品，或一個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作者必須創造性地運用敘事規範和謀略，使用某種語言的透視鏡、某種文字的過濾網，把動態的立體世界點化（或幻化）為以語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線性的人事行為序列。……它錯綜複雜地聯結著誰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與被看者的態度如何，要給讀者何種『召喚視野』」。頁 207~208。

³⁷ 「虛構的敘事」與「歷史的敘事」本有所區別，張素卿認為《左傳》可別稱為「解釋

雖然不免令人質疑《左傳》文、史概念尙未分明，導致選材有所混淆³⁸，但《左傳》以敘事手法，再現歷史情境，無疑更具啓發作用。事實上，敘事經常以「起」、「中」、「終」三個階段，鋪陳「糾紛」、「危機」、「解決」三個過程，藉以涵蓋事件的完成³⁹，《左傳》載叔段從擴張而終於謀叛，層層而進的描述，推究用意，乃是說明「危機」日顯；而追溯於「請制」、「請京」的爭執，祭仲、公子呂的進諫，則是「糾紛」的說明；至於「大叔出奔共」，則是事情的「解決」。進一步檢討祭仲、公子呂進諫內容，《左傳》分別各以兩段言論，代表對於叔段的反對與壓力，從祭仲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指出京已違制，「君將不堪」，到以「蔓草」爲喻，力陳滋蔓難圖的情況，引據設喻，情勢尙屬寬裕，也就無怪乎後世讀者會以爲祭仲「老奸」，所以如此「閒穩」，竹添光鴻《左

的敘事」，不可以後起「敘事」觀念，約束《左傳》；也不能以經、史分類概念來規範《左傳》，詳見氏撰《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年4月）〈緒論〉，頁29～32。確實指出《左傳》獨特屬性，不過本文則採寬泛觀點，純粹以文本閱讀分析。

³⁸ 劉鳳泉撰〈左傳敘事文學價值論略〉云：「歷史記事注重『事關軍國，事涉興亡』的大事，而文學敘事更青睞『委巷瑣言，州閭細事』。然而，在文史觀念尙未分明的先秦，人們對文史分野是缺乏明確認識的。《左傳》作者對此就表現出較大的主觀模糊性。《左傳》既詳載軍國大事，也勾勒小人物的特徵，取材比較寬泛。」《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1期（2002年1月）頁50。

³⁹ 王夢鷗撰《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第十九章「情節構造」云：「情節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就各個觀點上來觀察。一般地，就文體的大要上看，可說是包括著『起』、『中』、『終』三個階段。倘就動作的情形上看，我們又可說它是包括著『糾紛』、『危機』、『解決』三個階段。『糾紛』、『危機』是個戲劇性的動作，亦即表示相等的兩種力量在抗衡著，裡面包括有『動的』與『反動的』兩種作用。若使我們更就那兩力對抗的形勢上看，因雙方所付出的力量愈來愈多，要多至一方面或兩方面都感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才始解決。」頁259。從「請京」，到「將襲鄭」，鄭伯最後「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徹底「解決」此一「糾紛」，《左傳》基本上乃是依循此一敘事結構。

傳會箋》引魏禧云：

「早為之所」四字，正理權術俱盡。祭仲老奸，卻說得渾然無病。凡謀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閒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如此者，不可勝數。⁴⁰

祭仲「老奸」，其實是日後操縱君位的印象⁴¹，於此乃是作為「反對」力量的鋪陳。至於公子呂的進諫，言辭更加激烈，從「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力主除去，充滿激將的挑釁語氣，至「可矣。厚將得眾」，難以等待，決意而行的意志，皆是彰顯隨著叔段勢力日盛，其實反對力量也同之日益強大。可見《左傳》藉由兩段君臣商議，鋪排局勢更為險峻，衝突更加激烈的敘事脈絡。當然，前人也常比較兩人優劣，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祭仲聞『子姑待之』一語，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偪，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此時事勢既迫，故呂之言切，不若祭仲之含蓄，亦見機智不及仲處。」⁴²其實公子呂言語激切，並非機智不足，而是《左傳》層遞的敘事手法，危機日深，終至必須攤牌，公子呂代表強烈的「反對」力量，乃是情節發展之下有意的安排，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

「無生民心」，猶介兩岐。此云「厚將得眾」，直恐棄此歸彼也，一層進一層。⁴³

《會箋》確實掌握《左傳》敘事，一層深於一層的脈絡。當然叔段是否不得民心，此於敘事之中尚難窺見，但鄭國君臣之間，早已注意其中，卻是清楚明白，而在兩相發展之下，自然彰顯莊公沈穩，成竹在胸，一切皆在掌握之中，韓席籌《左

⁴⁰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2。

⁴¹ 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卷七，頁122~123。

⁴²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2。

⁴³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3。

傳分國集注》引吳曾祺云：

莊公雄鷲多智，不特姜與叔段在其術中，即祭仲、公子呂輩，亦莫能測其所為。觀其論虢叔之死，儼然為謀甚忠，娓娓可聽。使無他日之事，不謂之仁人之言不可也。⁴⁴

頗能說明莊公於敘事之中所彰顯的人物形象，當然更重要的是藉由層遞而進的衝突描寫，引起敘事的高潮，王夢鷗先生《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即澄清「高潮」一詞的定義，云：

「高潮」一詞，雖然常用為戲劇情節上的一個術語，然而戲劇上高潮的動作，卻是個平常的動作，而這動作只是被它前面的動作所引來的注意力之積累而增高。所以「高潮」不在動作本身，乃在它之「被注意」的頂點。換言之，高潮動作，在前要靠著層遞式的敘述，在後必有緊接著的解決，方始成立。因之，任何一種動作，能恰好佈置在這地位上，都照樣會顯成一個高潮。⁴⁵

敘事「高潮」並非動作本身，而是鋪陳之後產生的結果，而莊公一句「可矣」，「糾紛」終將解決，韓席籌《左傳分國集注》引吳曾祺曰：「『可矣』二字，具見莊公平日沈幾觀變，至是乃奮然而起。古人作文，一句可作數十句用，此種最不可及。」引劉培極曰：「前數層狀寫鄭莊之陰險奸詐，窮形盡態，至可矣二字，始為揭破。」⁴⁶「可矣」一句，蓄積能量，奔騰而出，所謂「奮然而起」、「始為揭破」的論斷，確實是切中《左傳》層遞鋪排之下氣氛的評語。而稍後伐京、伐鄆，勢如破竹，固然是莊公的謀略得宜，其實也是敘事蓄積「注意力」的結果。《禮記》云：「屬

⁴⁴ 韓席籌撰《左傳分國集註》卷九「鄭共叔段之亂」，頁491。

⁴⁵ 王夢鷗撰《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第十九章「情節構造」，頁263。

⁴⁶ 韓席籌撰《左傳分國集註》卷九「鄭共叔段之亂」，頁492。

辭比事，《春秋》教也。」⁴⁷以此而論，《左傳》剪裁史料，安排架構，營造事件高潮，誠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事實上，從莊公應對之間，洞悉世態，言簡意賅，更能得見《左傳》寫人之傳神，以祭仲質疑京之違制，莊公一句「姜氏欲之，焉辟害？」既承前文「愛共叔段，欲立之」，而所謂之「欲」，也就可以了解並非僅是乞求封地而已，於是叔段坐大，責任盡歸武姜，言之為「害」，終難逃脫，此既是莊公歸咎於武姜之言，也是《左傳》用以串貫全文的關鍵，前人常以莊公稱「姜氏」大做文章，其實莊公僅是推究緣由，稱謂之間，出於習慣，未必深有用意⁴⁸。不過，針對祭仲「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的質疑，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終於顯露心機，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胸有成算，一『待』字露出本心。」⁴⁹其實所謂之「待」，不僅關乎國策，更可窺其心態，莊公將以養叔段之惡，待其自敗，於是面對所有質疑，皆在「待」字中回應，事後種種發展，皆在「待」中顯現。而回應公子呂時，更斬釘截鐵，大膽斷言，曰：「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崩」，以「將」字呼應「待」字，叔段之敗，也就在此層遞而進的鋪排線索中，逐步坐實。

⁴⁷ 鄭玄注 孔穎達疏 《禮記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5年12月）卷五十〈經解〉，頁845。

⁴⁸ 吳闈生撰《左傳微》卷一「鄭共叔段之亂」云：「詞氣中便已不知有母。」頁10。然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云：「姜氏猶曰母氏。申生稱驪姬曰姬氏，趙盾稱適母曰君姬氏，亦其類也。女子重姓，舉姓可略其氏。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呼母為母氏，言其與己異氏也。」頁22。莊公之稱「母氏」為「姜氏」，實乃當時稱謂習慣，所以後文祭仲亦直接稱「姜氏」，並非有何怨對之意。

⁴⁹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2。

四、母與子的和諧

《左傳》既載叔段出奔共，並且說明《春秋》書法的用意，依理而言，既已完成事件始末的交代，針對《春秋》經文，也已完成解釋的功能，但《左傳》卻另起波瀾，載錄有關武姜之處置，不僅移置城穎，更誓言「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從前文鋪排，急轉而下，憤恨之情，溢於言表，既是承前敘事之餘波，更是回應前文武姜惡莊公，愛叔段的說明，王崑繩《左傳評》曰：「遙接姜氏，如天外三峰，若遠若近，文情特妙。」⁵⁰韓席籌《左傳分國集註》引吳曾祺曰：「轉出波瀾。」⁵¹點出《左傳》敘事另起事件，卻又絲絲入扣，其妙在於說明兄弟之間的「危機」固然「解決」，但「糾紛」之癥結所在，母子間的不合卻未有所釐清，所以層層鋪排叔段謀叛，最終回歸於武姜之處置。而有趣的是，《左傳》同樣藉由君臣商議的情節，來化解母、子失合的衝突，王崑繩《左傳評》云：「生出一人做結，與祭仲、子封遙遙作映。」⁵²正好點出《左傳》所載內容，基本上是以莊公與祭仲、公子呂、穎考叔等三人的議論為核心，前兩人針對莊公與叔段，而穎考叔則是有關莊公與武姜，敘述重心由兄弟移至母子，只是以敘事方式而言，三者同樣藉由君臣的應對，鋪排「糾紛」的「解決」，使得前後之間，有其場景的一致性，君臣之間，本為國事，而關心所及，卻是家事，選材已具巧思。只是不同於前文層遞漸進，鋪排高潮的方式，此處更具迴環之妙，吳闓生《左傳微》云：

古人高文多事外曲致，旁見側出之處。此篇本誅莊公之不孝，但嫌直率，故幻出穎谷封人一觀以形容之，若為莊公文過者，實文字波瀾曲致也。先大夫嘗謂，文外曲致乃精神旁溢之處，唯左氏、太史公時時有之，他人皆

⁵⁰ 王崑繩撰《左傳評》卷一「鄭伯克段於鄆」，頁2。

⁵¹ 韓席籌撰《左傳分國集註》卷九「鄭共叔段之亂」，頁492。

⁵² 王崑繩撰《左傳評》卷一「鄭伯克段於鄆」，頁2。

不逮矣。⁵³

吳闈生乃清末桐城名家吳汝綸之子，所以對於文章氣韻，體會特深，所以甚至以「幻出」來形容《左傳》引錄穎考叔入獻莊公之事，如同翻空而出一般，從人物安排而言，穎考叔確屬「旁見」之人；從敘事而論，君臣酬酢，更是「側出」之事，既非情理之必要，可以了解《左傳》乃是有意以旁出之事，達致文外曲致，以婉曲補前文之直率；以再現場景的描繪方式，改變前文層遞敘事的模式，則其安排，不僅生出一波，有敘事變化之妙，更具結構均衡考量。

事實上，以《左傳》敘事而言，既已交代「既而悔之」，又言明穎考叔「聞之」，一切既在意料之中，敘事也就無所謂引起注意的作用，反而引導讀者留意彼此間應對的細節。以穎考叔「有獻於公」，乃是出於設計，「食舍肉」，也是刻意的舉動，至於「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的一番談話，固然孝行感人，卻是純屬演戲，而對於莊公「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的慨嘆，穎考叔一句「敢問何謂也？」更是明知故問，一切既在穎考叔設計的情況下進行，就如同前文叔段在莊公的安排下坐大一般，同樣是敘事上有意的安排，卻是具有對比的效果。然而有趣的是，不同於先前的深沉難測，莊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其坦率態度與前文判若兩人，可見與穎考叔之相應配合，乃是出於君臣之間有意為之，只是既然是作戲，也就不必當真，孝之與否，並不重要，但下文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卻又針對穎考叔之孝大作文章，特加表彰，若非故意誤導，則有其深意，韓席籌《左傳分國集註》云：

考叔教莊公闕地見母，以遂其非人子所出之誓言，其不孝之罪浮於莊矣。
左氏純孝之褒嘉，錫類之詠歎，豈真贊美之哉！乃正言若反者也。其是之謂，亦猶其然豈其然乎云耳。⁵⁴

⁵³ 吳闈生撰《左傳微》卷一「鄭共叔段之亂」，頁11~12。

⁵⁴ 韓席籌撰《左傳分國集註》卷九「鄭共叔段之亂」，頁493。

所謂「正言若反」，當然是質疑《左傳》「君子曰」並非「真贊美」，雖然穎考叔巧為解脫，但不孝之罪，無可逃避，《論語·學而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既非義，自當幡然改過，知過能改，不失其德，然而莊公卻依從穎考叔「闕地及泉，隧而相見」的建議，巧為辯解，狡辭脫罪，反而更違君子真誠坦蕩之風，而《左傳》刻意詠歎，正凸顯其中別有用意，吳闈生《左傳微》云：

此詭激譎宕之文也，明謂鄭莊不孝耳，卻吞吐其詞，不肯徑出，故文特婉妙。⁵⁵

則稱賞穎考叔之孝，正用以諷刺莊公之不孝，以稱賞代替批評，有其正面陳述之功能，《左傳》以對比方式，彰顯莊公之失德，確實十分委婉曲折，只是穎考叔是否為孝，《左傳》其實並無佐證，唯有莊公改過，母子終能合諧，確是出於穎考叔的設計，雖然有其心機，但立意良善，合於人倫，所以《左傳》反覆稱賞，應是著眼於此，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

言穎考叔能感悟莊公，變其不孝之心為孝，則莊公為考叔之朋類。是孝子不乏，天錫之朋類也。考叔固非孝子，莊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機詐相投，以欺一世，而君子之論如此何也？古人寬於責惡，而急於勸善，故一有改惡遷善之舉，則錄其見行，而略其隱衷，忠厚待人之道然也⁵⁶。

君臣機詐相投，固然屬實，但母子失和，可以回歸於合諧，則是不容置疑之人倫樂事，勸善急於責惡，有其積極正面的教化功能，《會箋》確實提出更為深刻周延的詮釋。不過比較前後敘事方式，前文層層遞進，終至於兄弟攤牌；後文婉曲作戲，終於母子相合。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最終歸於合諧，平衡之間，其實有敘事結構安排的線索，所以回歸於「孝」，乃是莊公、武姜母子相合的重要契機，

⁵⁵ 吳闈生撰《左傳微》卷一「鄭共叔段之亂」，頁12。

⁵⁶ 竹添光鴻撰《左傳會箋》卷一，頁26。

《左傳》大加表彰，無疑是提醒回歸於母、子敘事主軸的安排。所以檢討其中，《左傳》最後刻意言明「遂為母子如初」，其實按覈前文之「初」，「莊公寤生，驚姜氏」，初生之時，母子已是不合，「寤」字取義，既取牴牾之意，衝突更是明著於名字，如此敘事，以文章章法而論，固然前後呼應，但細究內容，此「初」與彼「初」，實難扣合，若非故意露出破綻，則是有意無意之間，彰顯敘事者原本最「初」的想望與訴求，王崑繩《左傳評》云：「寫得子孝母慈，歡欣浹洽，與前文故相反射。」⁵⁷所以此處之子孝母慈，才是敘事者認為的人倫應有之「初」，至於前文武姜愛憎之偏，莊公蓄積之憤，其「初」皆有所不正，於是順序發展之下，導致國之不安，心之有悔，而「解決」之道，終應回歸於人倫之「初」，則《左傳》敘事之間，其用意也就十分清楚。事實上，《左傳》為求彰顯和樂情境，更以賦詩言志的方式，代替敘事說明，於是母、子相認，成為很特殊的情境描寫，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一入一出，互文見義，其中恐怕無法以敘事是否真實來考究，甚至難以推究武姜為何一改態度，然鋪排歡愉情境，卻宛如一齣戲劇安排終曲，而中融外洩，不僅是音韻相和的詩歌⁵⁸，也似乎是母與子終於相合的樂章，迴盪於人生「大隧」之中，能夠既入而出，則莊公之悔，人倫終能和諧，「大隧」豈非是極具隱喻的安排。

五、結論

《左傳》敘事之精彩，並非僅是事件的如實交代而已，更在於對某種價值與

⁵⁷ 王崑繩撰《左傳評》卷一「鄭伯克段於鄆」，頁2。

⁵⁸ 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隱元年傳注云：「『外』、『洩』為韻，古音同在『曷』部。」頁15。

意義的鋪陳，甚至是對於一種敘事結構的有意安排，於此，不禁讓人想起杜預〈春秋序〉所云：「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⁵⁹的說法，強調經、傳的對應關係，雖然至今《左傳》解經與否尚有爭議，但杜氏之說，卻是點出《左傳》在編年敘事之餘，確實有遙相契合，錯綜安排的結構線索，既是以義為主，敘事之巧妙，一存乎心，所以《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載晉公子重耳出亡，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其待遇分別是一禮，一不禮的間隔情形⁶⁰，其巧合的情況，已超乎情理之外，《左傳》有意藉由間雜而進的敘事結構，刻意剪裁史料，鋪排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情境，以達致敘事的效果，則其結構思惟不難理解。而《左傳》宣公二年載鉏臯刺殺趙盾，最後是觸槐而死，內心忠信兩難的思量，在旁人無從與聞得見的情況下，卻能明載於史冊⁶¹，不免讓人懷疑《左傳》誤將「軼事」入於正史⁶²，然而對於趙盾形象之塑造，卻又無疑更爲傳神生動。前者鋪排架構，後者點染氣氛，《左傳》剪裁運化之妙，確實工作造化，古今卓絕，《左傳》敘事手法之靈活，在於對事件的巧爲安排，叔段謀叛，源於莊公養惡，而莊公心機，肇因於武姜之偏愛，既層層而進，又迴環相合，最終歸於母、子如初，國事之紛擾，歸因於家事之不齊，而關鍵在於心之悔過，以古文家之閱讀經驗，云：

⁵⁹ 杜預撰〈春秋序〉，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卷一，頁 11。

⁶⁰ 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卷十五，頁 251~252。

⁶¹ 杜預注 孔穎達疏《左傳正義》卷二十一，頁 364。

⁶² 吳闓生撰《左傳微》卷四「晉靈之難」云：「此亦小節耳，且鋤堯之言，其誰聞之？紀文達已疑之矣。」頁 298。「軼事」也者，本出於閭巷之間的傳聞，內容傳神，卻又近乎謠言，細加考究，又無可按覈，史家以「軼事」凸顯形像，《左傳》載鉏臯觸槐而死之事，自殺亡故之人，卻能自剖心事，雖然啓人疑竇，卻無礙於塑造鮮明的效果。相同手法，如司馬遷撰〈管晏列傳〉，純用軼事，更加彰顯管子、晏子生動鮮活的特質。見瀧川龜太郎撰《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 年 10 月）卷六十二，頁 850~852。

「無相見也」以上，純是殺機，穎考叔以下，純是太和元氣，「既而悔之」一句，是轉殺機為太和的緊關。⁶³

前後手法之不同，於此可見，然而敘事主軸卻又緊扣於武姜、莊公之間，心念一轉，固然化戾氣於祥和，然其敘事之巧思，確實匪夷所思。本文嘗試釐清其敘事結構，則《左傳》載事，並非只是事件輯錄而已，更關乎敘事者巧思所在，分析其中，藉由敘事主軸的確定，安排一急一緩的情境，形成兩相呼應的結構，最終提醒人倫秩序的思考，國治既是出於家齊，而家齊存乎心念，此一暗示，又豈非儒家的諄諄之誨，前人或苛責莊公深沉而少慈愛，其實按覈全文，以隱藏敘事之目的，似乎更在於期許莊公「悔過」，就算穎考叔之虛假，仍然無損於母、子相合的價值，或許最後「大團圓」式的結局，過於老生常談，但《左傳》敘事卻依其結構，提供深切的暗示，令人深思，筆者略依其敘事線索，有以下之結論：

- 一、以事件的核心而論，叔段謀叛至為明顯，但《左傳》以莊公為核心，叔段反而成為隱沒的人物，此既關乎視角的選擇，也是敘事安排首要關鍵。
- 二、莊公既為事件中心，《左傳》更歸因於「莊公寤生」，武姜惡長愛次，偏愛叔段，於是母、子之間，成為全篇敘事主軸。
- 三、《左傳》分別以祭仲、公子呂與莊公的應答，鋪排層層而進的線索，既指出叔段野心日熾，也彰顯莊公謀畫之深，最終「京叛」，呼應「不義，不暱，厚將崩」的定律，而「大叔出奔共」則是「危機」終獲「解決」。
- 四、然而《左傳》生出一波，藉由穎考叔的出現，回應母、子的主軸，不僅巧為演戲，更展現不同前文的敘事情調，於是母、子終能和好。
- 五、分析《左傳》敘事手法，剪裁三段君臣應對，鋪排事件進行，內容雖然具有一致性，但氣氛卻截然不同，一急一緩，相互配合，既有敘事變化之妙，以結構而言，更具平衡的效果。

⁶³ 吳楚材、吳調侯編 《評註古文觀止》（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12月），頁2。

分析《左傳》敘事手法，推究其藝術構思，一窺其中隱藏之敘事觀點，雖是純乎文學的探究，卻可以了解《左傳》對於人倫和諧的籲求，或許文學與經學之間，有其肌理相通的線索，而巧為安排，彰顯線索，無疑是《左傳》精彩所在，筆者撮舉其要，不敢自是，尚祈博雅諸儒不吝指正。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Zuo Zhuan*: Using the story “How Duke Zhuang of Zheng Conquered his Brother Shu-duan in Yen City” as an Example

Chen Feng-Yuan*

Abstract

The *Zuo Zhuan* (左傳) is not only a great historical narrative but is also counted among the most treasured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reflects its philosophy. This paper uses one of the stories in the book, “How Duke Zhuang of Zheng Conquered his Brother Shu-duan in Yen City”(鄭伯克段于鄆) as an example, and attempts to clarify its narrative clues. In the story, Shu-duan’s betrayal of Duke Zhuang of Zheng is the result of Duke Zhuang’s leniency. This perspective is the result of the author’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how readers throughout history “fathom the mind of people of that time and place themselves in that situation”. In the *Zuo Zhuan*, it is related that Duke Zhuang’s birth caused his mother Wu Jiang tremendous physical pain and that this was the origin of all subsequent consequences and the reason that his mother loved her second son, Shu-duan, and hated her first son, Duke Zhuang, which becomes the axis of the story. The three conversations between Duke Zhuang and his courtiers are interrelated. Therefore, Shu-duan fleeing to Gong City was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crisis”.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conflict” came after reconcili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was finally reached between Duke Zhuang and Wu Jiang. The metaphors hidden within the story illustrate that affairs of state as well as family affairs were decided by peoples' emotions and the story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harmonious human relations. The story's artistic structure is not only outstanding, but is also integral to the creation of its narrative perspective. It is therefore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seems to be a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Keywords: *Zuo Zhuan*, Confucianism, narrative, structural thought